

人与诗：忆旧说新

[增订本]

卞之琳
著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卞之琳
著

人與詩：憶舊說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 / 卞之琳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4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ISBN 978 - 7 - 5336 - 3712 - 5

I. 人… II. 卞…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601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邮 编：230063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26. 50

字 数：315 000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40. 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3297 2846176

目 录

增订自序 1

第一辑

一条界线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诗人百年生辰纪念	4
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小段插曲	10
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	15
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	26
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	30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42
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	47
悼念戴望舒	58
悼冯至	60
又参商几度:追念罗大冈	63
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	65
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	69

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	80
追忆李健吾的“快马”	96
罗音室主吴世昌谢世志哀	105
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	110
突围小记胡乔木	127
淡如水中识醇味：追念王尘无	129
何其芳与诗派	132
何其芳与《工作》	135
何其芳晚年译诗	141
脱帽志哀：追忆方敬	150

第二辑

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154
《徐志摩选集》序	161
《徐志摩译诗集》序	170
《冯文炳选集》序	178
《戴望舒诗集》序	190
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	197
《李广田散文选》序	206
《李广田诗选》序	212
《孙毓棠诗集》序	217
吴兴华的诗与译诗	226
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	233
莲出于火：读古苍梧诗集《铜莲》	242
介绍江弱水的几首诗	247

第三辑

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	254
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	261
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	270
谈诗歌的格律问题	273
《雕虫纪历》自序	281
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299
与周策纵谈新诗格律信	312
答读者:谈“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	318
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	322
新诗和西方诗	332
译诗艺术的成年	337
《英国诗选》编译序	342
说“三”道“四”:读余光中《中西文学之 比较》,从西诗、旧诗谈到新诗律探索	348
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	358
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	364
难忘的尘缘	
——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	380
重探参差均衡律	
——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通途	388
无意义中自有意义	
——戏译爱德华·里亚谐趣诗随想	402
重温《讲话》看现实主义问题	408

相干与不相干

——读秋吉久纪夫论《尺八》诗 416

增订自序

广州《随笔》双月刊文艺百家图文系列 1986 年第 5 期所刊我随凑的一“文”，只是一句话——我写的诗中找不到一个“诗”字。倒也不是随便说的，说的既是事实，也验证了我的诗观。

我认为写诗应似无所为而为，全身心投入似浅实深的意境，不意识到写诗，只求尽可能恰切传导真挚的感应，深入浅出，力求达到最科学也即最艺术的化境，有可能与正常的一般读者或特定读者共享其成，言志也罢，载道也罢，不流于滥调，不沦为说教，宁取“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式，不沾“咄咄书空”气，杜绝现代西方所谓“自动写作”风——那等于扶乩。另一方面我也能赞赏以诗论诗(文)，例如清代赵翼或 18 世纪英国古典派诗人蒲伯所为、所得的一些警语，那是另一回事。

1939 年后，我一度完全不写诗，特别从 50 年代起，谈诗就多了一点。形势一转，我对师友，今已大多数作古的，不论相知深浅的前辈或侪辈，著述阅读生涯中实质上与诗有缘的，无论写有诗篇立有诗说与否，我为文针对他们或他们的产品，都以诗论处，讨论也好，追思也好，写序也好，评论也好，推举也好，借以自己立论也好，不注重人家的私生活(就其中个别有意义处另外为文)，因为有交谊，不免涉及自己(专讲到自己，则偶见他文)。自己的作品集序则只收了一篇。除了一两

篇探讨诗律文字或多或少可称学术性文章，所收各篇都不扮起一副学术性面孔，只是都贯穿了我自己既有坚持也有发展的见解。

全书分三辑，第一辑以忆人为主，第二辑以评作品为主，第三辑以实践中探讨问题为主，但不能截然分开，各辑内涵随时都互有渗透处。

第一辑述及师友，从朱光潜、闻一多、沈从文、梁宗岱、林徽因、叶公超、戴望舒、冯至、罗大冈、洗星海、周煦良、邵洵美、李健吾、吴世昌、师陀，到何其芳、方敬，以生年先后为序；第二辑论及诗文，从徐志摩、废名、冯至、吴兴华到古苍梧、江弱水，也如此（所有在世者今只此最后二位中、青年人），第三辑各篇则以写作先后为序。

本书初版于1984年，印过一万四千册，收文22篇，约仅十一万多字，现在删去了两三篇，增入后写的三十多篇，曾载香港《文汇报》文艺版、台北《联合报副刊》、北京《新文学史料》、上海《文汇报·笔会》、上海《文汇月刊》、香港《明报月刊》、北京《诗刊》等，都核改过个别时地事实细节，校订过个别误排，统一整饬过文词，总篇幅也就不止倍增。越发加重了出版社主持同志、责编和监印同志的负担，特在此也一并声明致谢。

1994年5月25日写

2000年5月5日改

第一辑

一条界线和另一方面：郭沫若 诗人百年生辰纪念

一转眼又是二十四年了，世事又历经巨变，我在 1978 年写的《完
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一文当中附带提及的一段个人
感观，至今似还不需多大修订，现在先抄录在这里：

我自己小时候一开始上学就是进的所谓“国民小学”，只是课
本还是文言，四年级初级小学毕业了，还体验过一年的变相〔旧
式〕私塾生活（读的也只是《孟子》和《左传》）。我是从自己家里的
一些旧书当中接触了一点旧诗词。接触到白话文是上二年制高
级小学才开始的，语文课本里选到的个别新诗并不令我喜爱。还是
是在一次我从乡下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从玻璃柜里挑出
一本儿童读物《环游地球记》的同时，我还买了“冰心女士著”的
《繁星》。这是我生平买的第一本新诗，也是从此我才开始对新诗
发生了兴趣。等到我自命不再是“小读者”的时候，还是初次读
《女神》给了我震撼，这不仅因为内容关系，而且感到新诗与旧诗
之间在艺术形式上从此开始划出了明确的界线。现在在我的印
象里，从《女神》（初版于 1921 年）以后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新

诗发展史上，还是数《志摩的诗》(1925)、《死水》(1928)、《望舒草》(1932)、臧克家的《烙印》(1933)、艾青的《大堰河》(1936)、何其芳的《预言》(1937)，或其后的《夜歌》、田间的《给战斗者》(1938)、冯至的《十四行集》(1942)、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1945)。这些诗集或长诗，从内容与形式，从题材和构思，从艺术表达的探索、开拓、成长、特色等方面说，都是标志了一些新的开端。我不是说这些是“里程碑”，我不是说这些诗的著者在以前和以后没有写过更好的诗篇，更不是说别人没有写过更好的诗篇。我只是以为，作为单行本诗，比较起来，它们既是独辟了蹊径，也是独放了异彩。

这些话在此重说，似可证明还多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事物在不变中也总有变，“五四”初期郭沫若（当时决不应称“老”）开一代诗风是人所共认的，日后的应景、表态的诗论、诗议、诗译、诗作，显得他的才华难以为继了。关于他后期写诗，社会上广泛流传了一句顺口溜：“郭老，郭老，写得多，好的少”，我也亲听到科技界年轻人笑说过，据说郭也曾自嘲说“诗多好的少”。^①

再过十一年，1987年，我在香港当代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②当中肯定郭老开一代诗风的公论，基本保持，还略加阐明，并略为补充郭诗作、译后变化及其影响的追踪与挑剔，现再摘录几段：

胡适不愧为提倡白话文学的急先锋，显然受西诗写法的直接

① 见郭沫若、陈明远合著《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页310，附录阎焕东《识得庐山真面目》。

② 参考本书所收此文。

影响，试写白话新诗。经过若干年的“尝试”，自称所写的“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后来偶用白话译现代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Sara Teasdale）平平常常的一首抒情小诗《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却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居然用他自己的说法，“开了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说来也妙，胡适早决意要进行“诗体大解放”，写白话诗要写得“自然”，打破整齐句法，自称曾从五七言旧诗、长短句词曲试验过“二三十种音节〔格律〕”，却一直像“踏破铁鞋无觅处”，建不起“新诗”的格局，一朝用白话把一首原是普通的英语格律诗译得相当整齐，接近原诗的本色，就有理由使他自己得意，也易为大家接受。从此，稍经一些同道合力“尝试”的初步“成功”，白话新诗的门路打开了。

但还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的出版……特别以其中直接受惠特曼影响而写的一些诗，终于和旧诗划清了界线：它们既摆脱了旧诗传统（特别是其中平直一路）构思的老套，又并不失诸平板、拖沓，语言节奏与语体散文有鲜明的不同，跨入了胡适等人还没有登堂入室的地地道自由诗的新领域。但是郭随后一动手译诗，却来了一个反复或转折。因为他所译的歌德、雪莱、海涅等人的原作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格律诗体，按照他日后所说“译诗得像诗”的主张，也不得不注意一点音韵。这倒和胡适译《关不住了！》一起，无意中为白话新诗节奏的规律化探索走出了一步，结果却又和胡适那首译诗差不多，开创了一种半格律体，只是较为松散，反而从旧诗袭用了滥调，连同陈旧的词藻。

这种诗体后来就成了新诗最流行模式的一个极端，到今日与同它对立、处在另一个极端的自由诗以至超自由诗的新模式，仍然分担着主流地位。原来，郭自己日后所说的“译诗得像诗”，实

际上是要中国传统诗化。我们自己写诗，自应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只是以求“喜闻乐见”为名，放纵和迎合惰性，以腔调烂熟为流畅，无视“推陈出新”，据此译外国诗，自然容易走样、失真、误人借鉴，自不待言。而这种“像诗”的所谓的半格律体或半自由体，一朝成为流行模式，就最便于作一般化、庸俗化的传导工具。

应该承认，就用这种模式译西方诗，郭沫若自己和别人也做出过贡献，对中国新诗创作自有功不可没的一面，主要在内容上。但是郭自己沿这个方向滑下去，随了思想进步以后与艺术的一同僵化，不仅诗创作再也显不出才华，到晚年竟至译出了这样的诗行——“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英国十六世纪诗人纳什原已陈腐的《春》这首诗的第一行）。虽然这是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译诗求民族化以至达到了十足庸俗化的流风，跟生硬的欧化“翻译体”一样，由来已久，影响所及，形成了顽强的习气，在中国现代直至今日的诗创作〔界〕正与另一路（实际上即与它对立而存在、成为同一事物的另一面的）极端风气分占了垄断地位。

这段话，我现在，特别在翻阅了一下新出版的陈明远编《新潮》一书以后，感到大有需要修订处了。郭老到晚年，特别在山雨欲来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及其初期，也算是受了身名累，在偶向旧体诗作中寄情以外，不得不如他自己所说的“应制应景”公开发表些违心言论，在不得人心的表态文字的隐蔽之下，极少人知道他的另一面。我在 1958 年 7 月和何其芳分别应约为辽宁《处女地》杂志“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特辑写的一点意见^①，谈及新民歌问题，引起误解，在何其芳招致的轩然大波的争论当中我也无端（因为分头应约写文前从未跟何交换

① 参考笔者的《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

过意见)被卷入作为陪衬,虽一再为自己的意见进行解释,百口莫辩,虽比其芳冷静一点,也终不免有点意气。一律不再读人家的有关文字,因此忽略了人家一些有道理的论点,现在才知道郭老就凛然发表过一些持平之论。他断然说“新民歌是有些局限性的”。^①原来郭在1940年就说过“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②,可见郭老晚年在运动中的一点卓然不群的艺术见解是有长远根源的。他过去一度公开斥责过食而不化的引进西诗体,包括十四行体(过去曾中译名“商籁体”,译音离原音差距较远,郭接受陈明远译称“颂内体”),晚年却私下与陈琢磨中国化十四行体,并说:“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形式!这才达到了闻一多几十年前提出的要求:既表现了时代精神又蕴含了地方色彩!”^③

同时我得阐释我在上引自己在1987年那段讲稿中对“半格律体”、“半自由体”的不敬意见实际上倒正合郭老所不满的“分行散文”加不能赋予一些旧词藻新功能而成的滥调这种“像诗”(似诗非诗)的非议,令我敬服。实际上我几十年先在实践上后在理论上探索新格律,却从不反对过自由体而且自己也试用过自由体,只是直至最近还在进一步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言特色,探索写、译语体诗的声韵规律,以求获得社会上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般人的共识,为使新体诗终能真正取代旧体诗成为现代主流的地位。^④

① 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页1~8,陈明远编《新潮》页304。

② 郭文《“民族形式”商兑》,收入所著《今昔蒲剑》,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4版,页331~348,是经香港大学1989年出版张曼仪专著《卞之琳著译研究》页70提起我才知道的。

③ 《新潮》页305~306。

④ 参考笔者的《重探参差均衡律——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通途》。

最后，我得说郭著《女神》在新诗发展史上划一条界线的历史功绩，已为共识，已成定论，他在另一方面的探索方向仅初露苗头，展示了新的开端，不论已达到的境地是否就适于融会中国传统和世界现代感应性而表诗情达诗意，仅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断潜心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千锤百炼它成“绕指柔”式的诗艺工具，这种精神即当永远可作后来者表率，也就显得青春常在，现正合以此纪念郭诗人的百年生辰。

1992年9月25日

(原载《诗刊》1992年第11期)

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 的一小段插曲

朱光潜这位美学大师，生前在我们熟人圈子里通常以字称“孟实”。我当面也只得称他“朱先生”，心里却总是想开玩笑叫他“孟夫子”。这个名号的含义，大家不难理解；单从他的仪表而想像到他一定从小就少年老成，单看他平时儒雅的风度、岸然的道貌，也就对我现在公开戏敬他的这个“溢号”，或者不会见怪吧？

他辞世已经两年。照例我写纪念已故师友的文字，总想不限于表态抒情，而不揣冒昧，还对于他们的功绩与艺术或学术成就，多少要说长道短一番。无奈对于“孟夫子”的诗论、文论，我虽有种种看法，有完全赞同的，也有不敢苟同的，一言难尽；而对于美学，我一窍不通，又不能置一词。还记得 1982 年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的庆贺朱光潜执教六十周年的小规模集会上，特别是听主持人宣读了周扬还保存的“孟夫子”当年写给他的一封答函以后，我很想当众说一点少为人知的内情，怎奈发言人踊跃，未敢插言。后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那封信，我还迟迟未能写几句。现在补写在这里，“孟夫子”已经读不到了，深以为憾。但是有鉴于今日朱光潜论著重又不断问世、朱光潜研究已成流行课题，而祖国和平统一已成海内外、海峡东西岸、华